

历史的迷惘

迷惘：寻觅治世之门

荣真 陈飞 张晓虎等著

这些若明若暗沉浮在末世浊流中的天之子，他们不幸成了时代的弃物，又有幸因其独特的时代位置而以其生命的闹剧，成为各自历史时期饶有意味的转折点，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被后人或切齿、或叹息，终于铭记。

- 荒唐的旋转
- 曹魏不忍君
- 心迷菩提惑
- 魂断扬州路
- 乖戾的悲欢
- 梦魇五国城
- 风雨逐逝波
- 高处不胜寒

怨生于不报，祸生于多
福，安危存于自处，不困在于
蚤豫，存亡在于得人。

汉·刘向《说苑·敬慎》

《新潮文史书系》发语

中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人们的文化意识已随改革的进程，日益向深层拓展，越来越多的人在面对现实的同时，把思考的触须伸向未来，也伸向历史，以便悉心探讨昨天、今天和明天的内在联系，确定自己的存在方位和奋斗目标。作为出版工作者，出于对时代和社会的神圣责任，我们设计了这一带有文化特征的选题，用编辑所特有的方式，投入大时代汹涌的新潮。

我们兴奋！我们快慰！

这，是一座便桥，桥的两端是文学和历史。桥下，温热的生命之水正汩汩流过。此桥，没有草图，“匠人们”根据自己的认识、想象和审美水平营构桥的形式。因此，它的价值不在本身，而在尝试的勇气。能否有更多的同道通过和加固这座桥呢？我们热望着。

卷首语·迷惘的魂灵

这里是一些人，是些曾经煊赫一时又归于沉寂的生命体。这些生命体，在诞育之初便负载着过量的荣华、权欲和希冀，负载着不堪其任的历史重托。终于，有一天，泥塑的金身崩塌，碎如粉屑，收拾不起。这也是他们所依凭、所代表的皇朝的命运——历史的命运。

迷惘在其生前，困茫在其身后。他们之中的几乎每一个人都曾做过圣君明主的梦，都曾勒碑铭，期不朽，有的人至死还沉迷在自己一厢情愿的梦里，从未醒来。然而历史却以其执拗的惯性，推动时代的车轮隆隆而来，辗过表象的繁华和金玉的肉身，全不顾迷惘者的探问和落伍者的哀鸣，更无论那千岁万岁的期许。

这些若明若暗沉浮在衰世浊流中的天之子，他们不幸成了时代的弃物，又有幸因其独特的时代位置而以其生命的闹剧，成为各自历史时期饶有意味的转折点，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被后人或切齿，或叹息，终于铭记。

然而，时流多转至今，已没有人为他们的悲剧而真正一掬酸泪。为高尚者的毁灭，春秋更替，泪已成河。而为这些历史上的“过程”，有不少还是暴君、昏君，人们又怎会自作多情呢？只是历史在其极度宽容和冷静的一面，仍以其思辨的力量，无情有意地切下了“手术刀”。

在史笔的洞明之处，人们看到了作为一个人、一个生命体的躁动和他们身后作为千千万万人、千千万万生命体的嘶喊——绝望中的希望，而身居庙堂之上的万民主宰，他的每一次自省，每

2 历史的迷惘·寻觅治世之门

一声叹息，都标志着一个迷惘的魂灵的某种觉悟，人们也仅仅看到这些，看到这些转瞬即逝的历史之光。就为了这微弱的光线，酷爱真理的人们，永远聚集在历史的门口：既觅求希望，更诅咒暴君！

范 烛

识于一九九二年春

目 录

卷首语·迷惘的魂灵	范炯	(1)
汉成帝		
荒唐的旋转		(1)
高贵乡公		
曹魏不忍君		(31)
梁武帝		
心迷菩提惑		(66)
隋炀帝		
魂断扬州路		(109)
唐懿宗		
乖戾的悲欢		(145)
宋徽宗		
梦魇五国城		(185)
明神宗		
风雨逐逝波		(228)
清宣宗		
高处不胜寒		(263)

荣 真

汉成帝：荒唐的旋转

要焚毁刘氏王朝的烈焰和阴火都已经烧到了他的身边，他仍然象一个混沌不开窍的陀螺，若无其事，极度亢奋地摇摆着、旋转着……

—

汉成帝永始四年（前13），武阳侯史丹死了。

史丹在朝中官至左将军、光禄大夫。他的九个儿子先后在朝内侍中诸曹，随侍皇帝。史氏一门封侯者四人，卿大夫二千石官竟出了十多个。其为人貌似疏诞无检，内里却心机谨密。他的宅邸里奴仆百余，妻妾数十。此人日饮醇酒，夜拥娇娃，极尽滋味声色之乐。汉成帝反倒称赞他“秉义醇一，旧德茂焉”，赏赐累达千金。

史丹是鲁地人，他的姑祖母是汉武帝戾太子的史良娣，也是汉宣帝的嫡亲祖母。因为有这一层血缘上的关系，所以汉元帝命他任驸马都尉，照护太子刘骜。

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构架是宗法等级制度，它使得“家天下”成为至高无上的政治原则。因此，历朝封建统治者都非常重视选择皇位继承人的问题，谨慎小心地按照“立嫡以长”的原则行事。如同汉初大儒叔孙通所说，太子为天下根本，本一摇则天下振动。所以太子一旦被策封，是不能轻易废掉的。可是，由于统

治阶级内部各派别各集团间存在着盘根错节的矛盾关系，由于皇帝个人爱憎好恶的变化，由于太子的德行有亏或能力不强，甚至太子的母亲在宫中失宠，都有可能引起权力再分配的斗争；太子的储君地位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太子刘骜的母亲是元帝刘奭的皇后，早在刘奭做太子的时候，就被刘奭疏远，当时她刚刚生下刘骜不久；做了皇后她也是经常独对孤灯。对一个宫廷贵妇而言，这可是最危险的信号。刘骜是元帝的嫡长子，降生后甚得宣帝喜欢，亲自为他取名，封他为世嫡皇孙。祖孙两人常在一起玩耍。元帝因为要秉承宣帝的遗旨，又见刘骜十分宽博恭慎，所以满心喜欢地立他为太子。谁知太子越大越不成器，好酒好色，太子宫被他闹得乌烟瘴气，元帝十分气恼。母衰子颓，前程凶多吉少。史丹就在此际被派去傅保太子，可见元帝还有些“治病救人”的热心肠。

情况很快发生了变化。建昭年间，汉元帝常常生病，将一大摊让人心烦意乱的军政事务统统推给朝臣，自己则寄情于丝竹管弦之间。他常常命令左右将鼙鼓安置在殿下，自己则凭依着殿前的栏杆，不断向鼓面投掷铜丸，击打出有节奏的十分急促的鼓声。客观地说，这的确是一种难度较大的技艺。动地鼙鼓宫中来，汉元帝乐此不疲。后宫及左右明音律者无一人能之，只有元帝的小儿子刘康能如法炮制，受到元帝的夸奖，说他有才气，是个人才。史丹同太子的关系，已经是一荣俱荣、一枯俱枯的关系，当即反驳道：“所谓人才，应当敏而好学，温故知新，皇太子可以当之。如果于丝竹鼓乐之间选拔人才，象陈惠、李微那样的宫廷乐人，其音乐才能要比丞相匡衡高明得多，可以做丞相治理国家了”。汉元帝无言以对，只好默然苦笑。

一波刚平，一波又起。建昭四年（前35），汉元帝的幼弟中山王刘竟突然死去。刘竟与太子的年龄相仿，自幼一起读书游戏，名虽叔侄，情若兄弟。刘竟受封的时候年龄还小，所以一直

未就中山。太子到刘竟的宅邸吊丧，恰巧元帝也在这里。元帝看见与弟弟一起长大的儿子，想起弟弟才十几岁就魂归九泉，不觉悲从中来，不能抑止，泪洒满襟。他突然发现太子的脸上竟无半分哀容，不禁勃然大怒：“难道有不慈不仁却可以承奉宗庙为民父母的人吗？！”责备史丹失职。史丹急忙免冠，诚惶诚恐地谢罪说：“臣见陛下哀痛中山王青春早薨，毁伤御体，所以建议太子不要哭泣，以免引起陛下伤心。罪责在臣，臣罪当死。”成帝听了这番解释之后怒气渐消。事实究竟是不是这样，现在已经无法考证清楚。不过我们却因此弄明白了，专断独行的皇帝活得也并不轻松。

但是太子的危机并没有过去。竟宁元年（前33），元帝病重，一直被他宠爱的傅昭仪及其子刘康侍奉在御榻前，而皇后和太子却不得进见。重病缠身，且又自知不久于人世，往往是人生最豁达最潇洒的时候，一切恩恩怨怨都将如过眼烟云，随风而散，何必带入地下，惹动无数阴魂一起烦闷不堪呢。可是元帝对立嗣问题却念念不忘，几次召尚书官，询问汉景帝废太子刘荣改立胶东王刘彻的掌故，想在临终前废长立幼。太子刘骜和他的母后、舅舅都忧惧不安，想不出什么好办法。

果敢行动的还是史丹。乘傅昭仪母子不在的时候，他直入元帝卧内，顿首于青蒲之上，涕泗横流地向元帝进谏道：“皇太子以嫡长而立，已经十余年，名号已系于百姓，天下人莫不归心称臣。如今见定陶王雅素爱幸，道路流言四起，均以为要废掉皇太子。如果真是这样，公卿以下必以性命为太子相争。臣愿先得陛下赐死，以示群臣！”元帝为人本来仁弱，重病中性格更脆弱，见不得史丹老泪纵横的模样。更重要的，是他深知废刘骜立刘康违反了立嫡以长的原则和宣帝的遗旨，担心群臣反对，引起社稷动荡，史丹的所作所为恰好证实了他的担心并非多余。元帝只好打消了废长立幼的念头，表示：“皇后素来谨慎，先帝又爱太

子，我岂可违旨！”就这样，百无一能的刘骜终于保住了太子地位。

二

轩车、轺车的车轮急速地滚动着，在京师积雪的街道上碾出了一道道杂乱的车辙；牛蹄、马蹄或慢或快地翻腾着，趟起一片雪雾。輶侯、将军薄昭的府邸突然热闹起来，一大群高高矮矮的官僚们一律穿着十分显眼的丧服，一见到薄将军，便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嚎起丧来，祈盼薄将军之灵早升天界。薄昭只好拔出佩刀，寒光一闪，自刎堂前。

据说薄昭擅杀了皇帝的使者，犯下死罪。因为薄昭为文帝登基即位立下不朽功勋，又是文帝的嫡亲舅舅，文帝不忍心公开诛杀他，只好想出这个办法，令群臣到薄邸哭丧，逼薄昭自裁。

这是汉文帝十年（前170）冬季的事情。

大约一个半世纪以后，汉成帝刘骜突然怒气冲冲地命令尚书官整理文帝诛薄昭的材料启奏。合朝文武不由议论纷纷，不知道此次该轮到天子的那个舅舅横刀自刎，命赴黄泉。

封建社会的国舅爷，特别在汉代，都是地位最显赫势力最强大的人物之一。“炙手可热势绝伦，慎莫近前丞相嗔”。他们基本上都是拽着其姊或其妹的裙带跃登要路津的，成为外戚集团的中坚人物。汉成帝的舅舅有好几位，组成了一个以王凤为首的王氏外戚集团，其最初的维系就是汉成帝母亲王太后的裙带。

王太后名政君。据说，她的母亲李氏怀她的时候，曾经梦见月亮飞入自己的怀抱。天子者，日也，月傍日边明，这不正是这个胎儿日后要贵为皇后的征兆么？显然这是后人别有用心的编造。王政君长大成人，出落得娉婷婷婷，温柔婉顺，颇得为妇之道。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王政君定了亲。可是还没等她嫁过去，未

婚夫突然一命呜呼。后来皇太子的弟弟东平王刘宇贪恋王政君美色，聘她为姬妾，可没等她进王府，东平王也莫名其妙地薨逝。算命先生算定王政君命当大贵。其父王禁深信不疑，请来先生教女儿读书弹琴。汉朝统治者生活糜烂，经常采择良家女儿入宫。由于她们没有职号，人微位轻，统称为家人子。汉宣帝王凤年间，王政君满18岁的时候，王禁将女儿献入宫中，在掖庭做了一名家人子。

同其他悲苦的家人子相比，王政君并不具备更优越的条件使自己爬上皇后的宝座。可是一个突如其来的机遇改变了她本来默默无闻、孤怀暗老的命运。

王政君入掖庭一年多后，当时的皇太子刘奭宠爱的司马良娣病危，临终前对太子说：“妾的死并非天意使然，而是因为您的诸姊妾良人在背地里诅咒蛊毒，要杀死我。”汉朝人上至帝王将相，下至贩夫走卒，普遍迷信巫蛊这一类的巫术可以致人于死地。皇太子恨死了那些婢妾良人，可又抓不住真凭实据。司马良娣死后，太子悲患病，郁郁不乐，后宫佳丽皆不得进幸。此事惊动了汉宣帝刘询。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平民尚且要传续香火，何况天皇贵胄？生子立嗣，是封建国家的第一要务。宣帝令皇后挑选家人子侍奉太子，王政君等5人恰被选中。皇太子对这五个如花似玉香气袭人的姑娘不感兴趣，可是又不好违背皇后的意旨，勉勉强强地说：“此中要一人就可以了。”当时王政君的座位最靠近太子，又只有她一人穿着绛绿大掖的衣服，十分显眼，于是皇后就派侍中杜辅、掖庭令浊贤将王政君送入太子宫中的丙殿。甘露三年（前51），王政君在甲观画堂生下刘骜。

黄龙元年（前49），刘骜当了皇帝，是为汉元帝。刘骜被封为太子，王政君被封为婕妤，其父王禁受封为阳平侯。三天后，王政君被立为皇后，王禁的地位自然又高了一层，其弟王弘也被任为长乐卫尉。永光二年（前42），王禁死去，他的长子王凤继

承了侯爵，为卫尉侍中。王氏外戚集团初具雏型。竟宁元年（前33），元帝病死，刘骜即位，是为成帝。王皇后被尊为皇太后，王凤为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增封五千户。太后的同母弟王崇受封安成侯，食邑万户。庶弟王谭等入也皆受封为关内侯，王氏外戚集团由此正式形成。

外戚集团对皇帝有一正一反两个作用。正面作用是拱卫皇权，使皇帝免受其他权臣和篡位者的伤害。作为皇权的附属物，尽管他们是享有特权的政治经济集团，也不得不这样做：保护皇权就是保护自己。反面作用是逐渐削弱并威胁皇帝至高无上的专制地位，最终使其成为自己掌中操纵的傀儡，甚至干脆取而代之。这里有一个基本前提，就是：在排挤皇帝的同时，要特别注意保护皇权，将皇权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所以，皇帝对于外戚大多怀有警惕之心，对他们既利用又控制。控制是否得当，主要取决于当时的客观形势以及皇帝个人的才干和精力。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从其最初，外戚集团就是作为皇帝政治（而不是皇权政治）中的离心力量而出现的。因此，一切外戚集团的活动，都是当时政治和社会活动的焦点之一。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的长久利益，为了维护本阶层的利益，世族地主集团、宗室集团等也会格外警惕外戚集团的活动。后者的势力愈膨胀，愈受皇帝信任，他们的反抗往往也愈强烈，愈具有韧性。

外戚集团利用与皇帝特殊的血缘联系（这种联系所带来的优越性，有时连宗室集团也自愧不如），往往突然崛起，迅速膨胀。相比较而言，朝臣们的势力弱小，同外戚直接抗衡的可能性不大。特别在皇帝优容外戚的时候，朝臣还只能迂回地委婉地表达自己的意向和情感。

建始元年（前32）夏季，京师一带突然出现了黄雾，四野弥漫。汉朝是中国历史上迷信盛行的一个时代。相面、算卦、占卜、巫蛊、阴阳灾异等等像瘟疫一样在社会各阶级和阶层中流行。汉

成帝询问群臣这是什么灾异，主何吉凶。谏大夫杨兴、博士驷胜等言官趁机借题发挥道：黄雾是阴盛侵阳之象。当年高祖刘邦与群臣约定，非功臣者不封侯。如今太后诸弟皆以无功受封为侯，违反了高祖的约定，外戚间还从未有过这样的事，所以天降此灾异示警。这完全是董仲舒天人感应神学目的论哲学的翻版。他们的见解颇得朝臣的赞许。其实，非功臣封侯者在此前亦有不少，可是他们打出老祖宗的旗号，以死人压活人，却十分厉害。王凤抵挡不住，慌慌张张地赶紧上书，承认天地赤黄之异咎在自己，当伏显戮，以谢天下。又说：“如今谅闇（天子居丧）已毕，大义皆举，陛下当躬亲万机，以承天心。”请求成帝批准他辞职。

严格说来，当时王氏外戚集团还没有构成对皇帝很大的威胁，他们的羽翼还不丰满，但实力还是比较强的。面对朝臣公开的指责和暗地的咒骂，他们尽可以从正面回击，做出大义凛然的姿态。然而王凤在这场最初的相斗中一触即溃，老老实实地承认由于自己的作为不当有违天和。无论他出于什么居心，都为皇帝控制外戚集团造成了一个绝好的机会；后者的谦卑正好说明了他们的骨架还比较软弱，尚不具备独霸政局的能力。在这样微妙的力量对比下，皇帝的专制权力和独裁品格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然而成帝却对此表现了非凡的宽宏大量和颇有些豪放的胸襟，不仅将责任大包大揽下来，而且满心满许地将朝政托付给自己的元舅王凤。他说：“朕继承先帝圣德遗绪，涉道未深，不明事义情理，所以导致阴阳错缪，日月无光，赤黄之气，充塞天下，其咎在朕躬。现在大将军引过自劾，欲辞尚书事，归大将军印绶，罢大司马官，是明责朕之不德也。朕委将军以事权，真心希望能有所成就，彰显祖宗之功德。希望将军全心全意辅佐朕躬，弥补改正朕的疏陋之处，不要有所疑虑。”这番语重心长的话基本上勾出了一个政治庸人的轮廓。成帝做太子时所受到的政治教育太少，好酒好色的东宫生涯使他在危机四起的西汉末期碌碌无为，自生

自灭。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成帝很快尝到了姑息优容外戚的苦头。左右向成帝推荐光禄大夫刘向的儿子刘歆，说他为人通达，极富才华。刘歆是西汉末的天文学家和目录学家。他的政治生涯自其始就与王氏集团搅在一起，是非非难于说清。直到清末，康有为还借题发挥，指责刘歆助王莽“篡汉”。成帝召见刘歆后十分欣赏刘歆的才华，要当廷拜官。左右人提醒他此事还没有通知大将军王凤。成帝不以为然地说：“此区区小事，何须告诉大将军？”不料想左右人等竟然叩头不止，坚请成帝通过王凤才可拜官。成帝只好通知王凤，王凤反对任用刘歆，成帝也无可奈何。

外戚集团之间也有矛盾。建始三年七月，京师军民传言大水泛滥，京师不保。百姓四处奔跑，老弱号呼，长安城中大乱，个别人甚至闯入了未央宫。官吏军民你推我搡跌跌撞撞地纷纷奔上城墙避水。汉成帝急忙在未央宫前殿召集公卿会议，商讨解决办法。大将军王凤提出，除太后、皇帝及后宫妃嫔上船以外，其他官吏和市民一律登城墙避水。这是一个有备无患的措施，其出发点无可非议，只是失之于对讹言不加调查。

左将军王商也是外戚。他的祖母是汉宣帝的外祖母，是名传一时的“黄牛媪”。王商的姑母王翁须即为宣帝生母。王商看不惯王凤的专权擅政，早对他不满。因此，他见会议上同僚们大多赞同王凤的意见，就摆出一副诉讼的架势，认为：“自古及今，即使无道之国，发大水也不会冒覆城郭。如今政治清平，世无兵革，上下相安，还有什么道理非得发大水，而且在一天之内突然而至？此必是以讹传讹，不宜令人们登城避水，惊扰百姓。”王商注重对实际结果的判断，这是他超过王凤的地方，但其前提是荒谬的。他立足在天人感应的基础上，吹牛拍马阿谀奉承，硬是吹出一个“太平盛世”，其实同昏庸懈怠只知渔色的汉成帝和惯于颐指气使发号施令的王凤一样令人厌恶。

作为三朝老臣的王商，元帝时由于在拥佑太子地位的问题上出过大力，所以颇得汉成帝的敬重。其实，他在历史上并未留下什么了不起的政绩，否则，一贯以卫道为己任的班彪班固父子肯定会展为其大事鼓噪。

这一次发大水的消息的确是以讹传讹。王商为安定京师吏民，避免人力物力上的巨大浪费立下了功勋。汉成帝为自己有这样的股肱之臣而兴高采烈，几次褒扬王商的超人的胆识和准确的判断，而大将军王凤则惭愧非常，自恨失言。

第二年，那个在朝专以经义奏对，在野惟知兼并土地的丞相匡衡死去，王商做了丞相。据说其人身高八尺，体格魁梧，威风凛凛。匈奴单于在未央宫朝覲成帝时曾“仰视其貌，大畏之，迂延却退”。汉成帝闻言又感叹道：“此真汉相矣！”

纵然一副好皮囊，腹内原来草莽。王商当政期间并没有使大汉帝国繁盛起来。他唯一的本领就是以阴阳灾异之说作标准，处理一切政事。王凤的亲家杨彤在琅邪做太守，当地陆陆续续发生了14起天灾。王商却派人按问杨彤，认为是他为政不清，致遭天谴，使善良的黎民百姓遭殃。王凤当然反对，认为灾异天事，与人事无关，不应按问杨彤。于是王凤罗织罪名，逼迫成帝将王商罢免。王商免相后三日呕血而死。

这场外戚间的争斗以王凤集团的胜利而告结束。尽管有汉成帝的回护，王商还是惨遭败绩。封建社会就像一盘大磨，将磨盘上下磨道内外的一切都碾得粉碎，只在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皇帝和权臣安然无恙。极端的时期必然产生极端的人。被班彪父子吹捧为博览古今尊严若神的汉成帝，身处又稠又粘的没踝的时代泥浆中，对身后涌来的巨浪毫无觉察，对王氏集团擅政给刘氏天下带来的危险毫无觉察，对自己最终也要被政治大磨碾碎的趋势也毫无觉察，相对于那个天灾人祸并起的极端混乱的时代而言，他自己也是一个极端，一个荒唐的、病态的端点。汉成帝没有直面惨淡的

人生，也没有在纷繁淆乱的世情面前背过脸去。看起来是自相矛盾的，其实却像太阳东升西落一样正常。因为他不懂得人生和世情究为何物。在我们看来，汉成帝的生活对于封建专制制度是十分正常的：他在出生后不晓人事，在成人后不晓政事。最需要精明强干的铁腕人物的时代却造就了这样一个浑浑噩噩的糊涂虫，造就了一个完全不能抑制臣下甚至不想抑制臣下的政治庸人。这难道不是一个最典型的极端和非常之象吗？然而每一个封建王朝的末期都有一个或一批汉成帝这样的无能君主，岂不恰好说明，他们的周期性出现是十分正常的吗？

事实证明王商事件不是一个偶发的事件。汉成帝酒色过度，多灾多病，久无子嗣。他和母亲王太后虽然曾险些被定陶王刘康及其母傅昭仪挤下台去，却并不记恨，母子两人自元帝死后，一直善待刘康，赏赐给他的金银财宝十倍于其他诸侯王。善良而美丽的人性唯有在这里才闪出熠熠的光辉。刘康从封国风尘仆仆地赶到京师朝觐天子，汉成帝似乎满怀兄弟亲情，舍不得放刘康回封国，留他长住京师。成帝感伤无限地对刘康说：“我没有儿子。人生无常，也不必忌讳，一旦有个好歹，我们再不能相见了。你就长住京师陪着我吧。”这里的潜台词已经非常清楚，汉成帝打算立弟弟为储君，搞兄终弟及。心有灵犀一点通，定陶王刘康从此朝夕侍从兄长，阴暗的朝堂上仿佛第一次弥漫着温柔敦厚的真切情感。

皇帝的世界和等级的世界一样，手足亲情不可能随心所欲地得到体现。大将军王凤对刘康长住京师十分不满，处心积虑地要把刘康撵回偏僻的封国去。

阳朔元年（前24）二月，发生了一次日食。迷信透顶的汉朝官僚又可以对此大惊小怪议论不休了。王凤上书天子，认定日食是阴盛侵阳之象，暗示定陶王刘康与成帝的关系就是阴盛侵阳。表示刘康应当奉藩在国，如今留侍京师，诡正非常，天以日食之象示警。要求成帝尽速遣刘康回封国就藩。面对王凤咄咄逼人的

进攻，懦弱的汉成帝只得令弟弟离开京师。兄弟二人泪眼相对，生离死别。

由此引起了朝臣第二次反对王氏外戚集团擅政的运动，发难者是京兆尹王章。王章，字仲卿，泰山钜平（县名，在泰山郡，故城在今山东宁阳县东北）人。年轻时在京师求学，才华横溢，因贫病交加，连床被子也没有，只好卧在用乱麻编起来的“牛衣”中。他觉得自己不久于人世，涕泪横流有气无力地同爱妻诀别。爱妻柳眉倒竖，杏眼圆睁，指着他大骂道：“仲卿！那些朝廷显贵们有谁比你更有才华？现在贫病交加，自己不激励奋发，反倒哭哭啼啼的一副穷酸相，真真没出息到家了！”经此一顿当头喝骂，王章又振作起来，以文学补官。成帝朝历任谏大夫、司隶校尉等职。在朝中以刚直敢言著称，权臣贵戚对他又敬又怕。

王章早就对外戚专权排挤皇帝不满，这次天象变异使他得以将多日的积怨和怒气如火山爆发般倾泄出来，上疏反对王凤借日食赶走定陶王刘康。成帝忽然聪明起来，将左右统统赶出殿外，偌大的未央宫前殿只剩下他和王章两人。成帝询问王章对日食的看法，王章侃侃而谈：“天道聪明，佑善罚恶，以祥瑞灾异为符效。如今陛下没有子嗣，亲近定陶王，是承继宗庙、巩固社稷、上顺天心、下安百姓的正义善举，应当有祥瑞自天而降，怎么却引来了灾异？灾异的出现，是因为大臣专擅国政。今闻大将军将日食灾异归咎于定陶王，这是别有用心。将定陶王遣回封国，是欲使陛下孤立于上，以便于他专擅朝政，逞其私欲，这不是忠臣所为。再说若追究责任，现今政事无大小皆由王凤决断，陛下不曾有丝毫的干预，王凤不反省自责，反而嫁祸善良之人，赶走定陶王。此大罪一也。前丞相乐昌侯王商及先帝外属，内行笃厚，威望甚重，位历将相，乃国家柱石之臣。其人操守廉正，不肯曲节攀附王凤，终于被王凤以闺门之事谮免，忧郁而死，世人皆为之哀伤。此大罪二也。另外，王凤明知其妾妹张美人曾经嫁过人，于礼不